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第 **8,9** 期  
1997年9-10月

### 本期要目

【学者论坛】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李慎之

【海外采撷】

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美)塞缪尔·亨廷顿

【专题论文】

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

马戎

【读书笔记】

在美国的华人：一部职业变迁的百年史

郑宇

【学术活动信息】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1997-1998 学年第一学期“读书会”内容安排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编者按】**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自发表后，在我国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费孝通教授在读了李慎之先生的评论文章后，特向我们推荐，要我们也好好读一读。所以经李慎之先生同意，本刊这一期将他的文章与亨廷顿最新发表的文章一同刊出，以供读者讨论。为了使读者们了解美国种族与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同时刊登了一篇论文和一篇读书笔记，以供参考。

## 【学者论坛】

###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李慎之

亨廷顿又发明了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虽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还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正在走向衰落的前景。为延缓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就要守住北大西洋公约。充分表达了他对美国以至全世界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忧虑。他最担心的事情是“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对非西方人口超过西方人口，现代化的结果却成为“本土化”的沃土受过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却肩负复兴本土文化的使命这种状况亨廷顿感到恐惧。

1993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其主要意思是说在华约垮台、苏联瓦解、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就是冷战）消失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按照他的分类，现在世界上还有七、八种文明，即：（一）西方即基督教文明、（二）儒教主要是中国文明、（三）日本文明、（四）伊斯兰教文明、（五）印度教文明、（六）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七）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八）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他本人所属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教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国为甚。秋季号的《外交》季刊就发表了七篇驳斥亨廷顿的文章。但是，亨廷顿对此并不服气，又在当年《外交》的11/12月号（按：就从这一期起，《外交》季刊改为双月刊）撰文反驳。题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标题是《冷战后世界的范式》，借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说明他提出的“文明”已取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在此以后，世界各国的评论不断。就我的视野似乎尤以中国为多，猜想这大概是他明确以中国文明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有关，因此难免不引起中国学者义愤填膺。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同志还特地在1995年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把中国学者的各种评论收集起来。除了一篇介绍亨氏理论要旨与他自己写的对中国学者论点的总评介外，收文26篇，据说还远未收全，真是洋洋大观，使我大开眼界。

不过，亨氏意犹未尽，大概真想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创立一个欧几里德式或者爱因斯坦式的范式，又在1996年底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明的冲突与重造世界秩序》。全书还来不及看到，

可是他又在同年末一期《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 18 页的长文《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作为他那本书的摘要。中国的《参考消息》曾予详细译介，读者应当超过百万。只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多少反映，《文汇报》最近倒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多囿于三年前的那些老观点，看起来有点文不对题。现在只好由我来凑趣试加评论，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全文反复申明的主旨就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甚至引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说：“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价值，亚洲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既然如此，发展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者大可表扬亨廷顿进步了。他确实认识倒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曰多极化的世界。这个事实或者趋势，已经为西方世界中心的美国，而且为自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就是美国 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的名门望族的当代名教授所肯定、所承认，当然是值得称道，值得欢迎的。

这样说，决没有美化亨廷顿之嫌，细读全文，他除了在解释何为西方文化时不免有点自我表扬而外，对其他文明、宗教、种族……并无恶毒攻击或贬低之词。相反，他还看到了西方已经在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要明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完全是一副退守和无可奈何的姿态。

但是，从亨廷顿的三篇文章仔细寻绎，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难言之隐”，不过是在三年过程中通过三篇文章慢慢地、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来的，而且最后也并没有明白说透。

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却在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中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中国的读者一般不大意识到美国近三十年逐渐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至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大，然而真正大的影响还在后头。三年半以前亨廷顿的第一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正在那个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美国还是一个熔炉吗？》的“封面特写”，列举事实说明，由 WASP 主宰美国的时代正在过去，相反，不但它在美国已经成为少数而且以它为中心的全体欧裔移民，也就是接受美国价值的全体白人也即将成为少数。而几百年来一向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则已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少数民族，而且在一些最激进的左派自由主义白人制造的理论支持下提出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包括欧洲文明都源于非洲黑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都是黑人。他们反对美国以 WASP 的价值标准同化外来移民的原则，主张大学不再开设单一的教授西方文明精义的课程而要平等对待一切少数民族的母文化。这在某些名牌大学，已经实际施行。除了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比白人快而外，上升得最快的是拉美裔人，美国称之为 Hispanics，如果再加上亚裔人，那再过 50 年就可以超过全部欧裔白种人。除了黑人当年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因而已失去自己固有的语言外，其他族系，尤其使西班牙语系的拉美裔人（大多是本地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种）还强烈要求不能以英语为唯一的法定语言。在许

多地方，西班牙语已取得与英语并用的合法地位，不但大街上的招牌与告示已双语并用，而且在有些社区说英语甚至没有人理你。总而言之，美国这口坩埚虽然在过去二百多年里（美国历史实际应从立国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算起）曾经熔化了从欧洲去的各个民族，但是现在却明显地表现出投料太多，老汁太少，火力不足，锅也太小，再也熔化不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成分了。甚至于被钉着镣铐从非洲运到美州的黑人，本来在语言与宗教这两方面已不得不接受主人给予他们的东西而且信奉基督教已达两百年之多，自从40年前的民权运动以来也竟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改宗皈依了美国从来没有的伊斯兰教，而且一再声言要成立“伊斯兰国”，甚至要求把带有黑人发音特色与非规范的语法特色的黑人英语制定为美国法定语言之一。诸如此类种种事实都不但使以正宗西方文化自傲的白种美国人极端厌恶，而且不寒而栗。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他们知道他们还能够雄踞权力与财富的颠峰的时间已经指日可数了。

可以猜想，在迄今为止还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国，这是一种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感情或者思想，但是外人却几乎看不出来多少表露。其原因就在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悖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公开表现，如果你是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粗人”，你可以参加臭名昭著的“三K党”或者近年才出现的白人“民兵”，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西方价值与美国理想的卫士——一个有身份的自由主义者，你就只能把这种思想和感情压在心底。因为在几百年特别近几十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直译就是政治正确性。在美国要做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不能表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约定成俗，越来越严。比如对黑人吧，本来叫Nigger（黑鬼）也无所谓，叫Negro则是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这样的称呼完全可以挨‘耳光，起码要叫black，最文明正规的叫法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你嫌罗嗦麻烦吗？可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学过英文的人全知道，主席的对辞是chairman，可是现在就得叫chairperson，因为如果你称呼的主席是女性，你就犯了侮辱女性，在政治上不正确，或曰违反PC的错误了。这方面的清规戒律极多，对英语和对美国的知识两者都极为有限如我个人，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一不留神就会犯规出错，招人鄙视（以为你不文明），甚至仇恨（以为你冒犯了他或她）。因此李光耀在向美国人宣扬“亚洲价值”的时候，说完了“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然”这句刺耳的话以后，还要自我解嘲地加上一句“这样，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他可以这样大胆狂言，因为他是一个亚洲的政治家。要是他像亨廷顿一样的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等待他的命运就很可能先是群众的抗议，然后是学校的解聘与失业（因为这样的人别的大学也不敢要）。正因为如此，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实在是努力压低了嗓门。而我们对他的心事的猜测也只有凭我们作为非美国人的特权了。

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是以文明—宗教—宗族三位一体的。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原因就在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气氛下，这是一个最危险的题目。但是这又是他实在躲不过的话题，事实上在各方批评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挤出一点儿来，比如直到他被迫答辩的第二篇文章中才透露出他真正的恐惧来。他说：“文明的范式也许能适用于美国，……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肤色意识强烈的社会，……美国正在变成族群和种族（ethnically and racially）问题上越来越殊异的社会。据国情调查局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和10%是亚裔人。”换言之，2050年是欧裔白人从多数变为少数的临界点。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文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

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随历史上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仍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中国的老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亨廷顿不会不知道人类几百万年进化造成的血缘、形体、肤色等等的种族差异远比几千年造成的文明差异更难弥平。他只是不感冒被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大不韪而公开说出来罢了。

不要以为只有亨廷顿一个人有这样的危机感，在美国，这是一批越来越多的被称为“新悲观主义者”的共识，在文明冲突论发表的前一年，也许可称为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史学权威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出版了《美利坚的非合众化》（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表示了与亨廷顿同样的忧心。与亨廷顿几乎同时，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出版《失控》一书，一再强调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其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的种族构成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国徽和硬币上都印着美国的国训E PLURIBUS UNUM三个拉丁字，意思是“一出于多”或者“合众为一”，现在，潮流倒过来了。

正因为如此，1993年6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的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三个月以后，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与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谈天，问他对亨廷顿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简单，“desperate”（绝望），倒也干脆。

亨廷顿有没有把美国的问题投射到全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按照亨廷顿的标准，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欧洲北美人口历来不足世界1/5，何况近几十年来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却不断上升，比例的反差越来越大。对亨廷顿来说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减少，他认定10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其次，西欧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剧上升，许多国家因此而出现了与美国相同的内部问题。像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出现的新右派、德国出现的新纳粹和澳大利亚最近出现的反亚洲人浪潮都在加强着亨廷顿的论据。

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

另外，亨廷顿对国际形势提出的若干自己的观察，确实可以说是深刻的，而且已被事实所证实。例如，他认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会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他看到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看来似乎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但都受到精英分子越来越强烈的抵抗。他看到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与第一代不同，后者更强调本土文化与本土价值。由于他所谓“西方价值的悖论”，正是全球化带来了民族主义，也正是现代化带来了各种宗教（或者更笼统地说各种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他还看到，英语表面上似乎越来越国际化，但是英语的实际势力正在减弱。民主政治往往趋于使政府乡土化而不是世界化。还有，在西方认为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如果推广到非西方就是帝国主义。……

决不能随随便便把亨廷顿叫做种族主义者，在他的文章中并不能容易地嗅出这种味道来。他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但是他已不敢公然嗟叹盛世难再，而只敢承认西方已经衰落。他说“西方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它的普遍性”。<sup>1</sup>不难推断，从西方中心主

---

<sup>1</sup> Samuel H.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义的时代的颠峰跌落下来，他心里是不会好过的。他为西方设计的战略只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自保，但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黄祸、绿祸与黑祸”面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是一位亚洲朋友的话，绿祸指伊斯兰、黑祸指黑非洲，因此还不能把这样“政治上不正确”的“反PC”的话安在亨氏头上）。对于黑祸，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恐惧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黑非洲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因此在他的文明分类中，只是把“非洲文明”列为“可能有第八种文明”。他也有相当的“统一战线”意识，把日本文明单列而且与西方文明拉在一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他极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做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而且对俄罗斯也偶做拉拢之意。考虑到俄罗斯人既是白种人又是基督徒，这一意向不难理解；但是几十年的敌对，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顾虑重重。

亨廷顿的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设人性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如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例外。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历史上的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法国文明、西班牙文明...各种各样的特殊文明来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范围相当广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对照他自己说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西方的内战”的话，矛盾尤其明显。为什么50年前还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今天就已经可以统一在“西方文明”的旗帜下了呢？但是亨廷顿所说的“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这话应当是可信的。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历史从苏美尔人算起还不过七千多年，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挫折以后也不敢相信再有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因此亨廷顿的下一句话，也就是第一篇《文明的冲突》的结语——“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种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听起来有一点伪善的味道。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决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而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亨廷顿虽然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时他也不能排除21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对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再走过一段满荆棘的道路才能通到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本文原载于《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二期，经作者同意，特在本通讯发表）

【海外采撷】

## 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章说，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此外，他还将美国自己的问题都推给了外来移民，认为，多元化削弱了国家认同；他断言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并宣称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

### 对国家特性认识不一

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有过多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激烈、广泛、混乱的辩论。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是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对这一新的环境的解释众说纷纭，如历史的终结、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对抗、向传统强权政治前景的回复、濒于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冲突的扩散、文明的碰撞、一体化与分裂之间的对抗趋势。新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对美国在其间的利益自然难有定论。然而，这并非是造成混乱的唯一根源。要确定国家的利益，必须首先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取得共识。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必须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国家，方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所在。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特性有两个主要成分：文化与信念。第一种成分主要是指价值观和早先移民的习俗。这些移民是北欧人，主要来自英国，信奉基督教，绝大部分是新教徒。这种文化主要包括英语和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传统。

美国特性的第二个成分是美国领导人在立国文件中所阐明的一系列普遍的主张与原则：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经济自由主义、有限的政府、私人企业。

当然，构成美国特性的这两种成分是密切相关的。然而，现在冷战的结束与美国社会、文化和人口的变化使人对美国特性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正确性与作用产生了怀疑。由于对国家特性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美国人变得不能确定他们的国家利益，因此也不能确定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商业利益，于是超过国家和非国家的民族利益便支配了外交政策。

### 失去了对手

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一最深刻的问题，是由约翰·厄普代克小说中深受困扰的主人公拉比·昂斯特伦以奇特方式提出的：“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致力于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原则，那么，若是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到这些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会怎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反对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在冷战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他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美国国内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和对外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和对外政策中的许多主动行动，如对希—土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北约、朝鲜战争、核武器和战略导弹、对外援助、情报活动、降低关税壁垒、空间计划、争取进步联盟、与日本和朝鲜的军事联盟、支持以色列、海外军事部署、前所未有的庞大军事机器、越南战争、对中国开放、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和其他反共叛乱，均是以这一目标为依据。如果没有冷战，诸如此类的重大计划和主动行动的理论根据也就不复存在。80年代末，当冷战渐进

尾声时，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宣称：“我们正在做真正令你们恐惧的事情——我们正在使你们失去一个敌人。”虽然战争有时可能会使社会分裂，但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之间的共识和凝聚力。

冷战加强了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一致性。冷战的结束可能会削弱或至少使这种一致性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对联邦政府的反对日益强烈，因为说到底，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国家特性与整体性在体制方面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如果联邦政府仍然保护这个国家免受一种严重的外部威胁，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会不会去爆炸联邦大楼、袭击联邦法官？过去，制造此类爆炸事件的通常都是以美国为敌的外国人，许多人对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的第一个反映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新敌”——穆斯林恐怖分子干的。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了一种心理需要，即认为这样一种行动必然出自一个外部敌人之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爆炸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敌人所致。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情况下，一个敌人的存在可能对群体的内聚力、士气和成就有积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进步。目前，由于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广泛得到接受，美国缺少一个它能令人信服地抗衡的国家或威胁。萨达姆·侯塞因作为一个对手，是根本不够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过于分散，在地理上也过于遥远。中国的问题太多，它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也太遥远。

然而，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多文化的种种力量，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它也许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以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两千多年前，在公元前84年，在罗马人消灭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军队、完全征服了已知世界之后，苏拉问到：“现在世上已没有了我们要打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将如何？”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几年之后，这个共和国便崩离析。等待美国的不大可能是同样命运，然而，美国信念还会有多大吸引力？还能得到多少支持？在没有对立的思想的情况下它是否还会生气勃勃。历史的终结、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可能会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

### 思想的多样化

美国社会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加剧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起分裂作用的影响，这两个趋势就是移民的范围和来源的变化，以及多文化影响的增强。

过去对吸收移民所抱的忧虑已被证明毫无根据。直到前不久，移民们来美国还是因为他们认为移居美国是一个成为美国人的机会。然而，现在人们来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保持其原有身份的机会？过去，移民们如果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就会感受到歧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有些移民群体，如果不允许他们置身于主流之外，他们反会感到受歧视。

多文化和多样性的思想加强了这些趋势，并使它们合法化。它们否认美国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存在，谴责同化，突出种族、民族和其他国家文化和群体的地位。它们还对美国信念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提出异议，要以主要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偏向界定的群体的权利取代个人的权利。

如果美国真的变成了多种文化并存，美国的特性和统一将取决于政治思想的不断统一。美国人本来把他们为自由平等之类的普遍的价值观进行的奋斗视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巩固这个伟大而独特的国家结构的纽带”。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共同文化来支撑，这些原则不过是国家统一的脆弱的基础。正如认知不一致论认为的那样，人们可以根据改变了的外部环境较快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和信仰。在整个前共产党世界，上层人士已经转而标榜自己为忠



实的民主派、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或热情的民族主义者。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思想体系同国家特性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曾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还将继续生存发展。没有共产主义，中国还仍将是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在各自的历史上也曾有各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美国的政治思想归于终结，它是否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苏联的命运是使美国人清醒的一面镜子。美国与苏联大不相同，但是，从传统的角度说，它们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它们又彼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是以思想体系给自己定位的，而苏联的例子证明，作为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这种基础可能要比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基础脆弱得多。如果多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识发生分歧，那么，美国就可能同苏联一道落进历史的垃圾堆。

### 寻求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对所有或大多数美国人都很重要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愿以鲜血和珍贵之物予以捍卫的利益。通常，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对萨达姆采取的军事行动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他威胁了获得波斯湾石油的可靠而又省钱的途经，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悍然入侵并兼并了另一个国家的贪婪的独裁者。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寻找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力量，而是寻找能将美国的力量派上用场的目的。

这种需要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机构急切的寻求使美国有理由在世界事务中继续发挥冷战时期所发挥的那种作用的新目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五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防止有人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在美国边界上出现敌对的力量或出现握有海上控制权的力量；防止全球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

然而，这些利益受到那些威胁呢？针对美国的核恐怖可能是一个近期的威胁；中国作为一个东亚霸主的崛起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威胁。除了这两个威胁以外，很难看出国家利益委员会所确定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任何隐约可见的重要挑战。新的威胁毫无疑问会出现，但是，鉴于眼下并没有威胁，人们便对那些旨在引起国人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唤起国人对重要的对外政策主动行动的支持的各种宣传就置若罔闻。政府呼吁“扩大”民主，却得不到公众的响应，而且政府自己的行动就暴露出它的呼吁是言不由衷的。新保守主义这鼓吹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的论点像冷战时期主张销毁核武器的论点一样显得不现实。

人们常常论证说，要解决世界性问题，就需要美国来“领导”。情形往往确实如此。然而，要求实行领导的呼吁回避了“领导做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的问题也就是美国的问题。可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世界许多地方存在弊端，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者有兴趣或有责任来匡正这些弊端。国家利益委员会说，要就国家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就需要总统来领导。然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没有理由过问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对外政策机构在要求总统为一项根本不会被接受的事业提出理由。这种寻求国家利益的努力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没能产生能够获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广泛支持的、人民愿意为之投入较多力量的那种目的。

### 商业主义与民族意识

缺乏得到普遍支持的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回到孤立主义状态。美国依然参与国际事

务，但是它现在的参与不是着眼于国家利益，而是着眼于商业和民族的利益。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可以用经济与民族方面的排他主义来界定。冷战时期为宏伟的国家目标服务的体制和能力——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情报方面的体制和能力——现在转而被用来为狭隘的次国家的、超国家的甚至是非国家的目的服务了。现在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论证说，对外政策正是应当为这些利益服务。

克林顿政府一直重视“商业外交”，把促进美国出口定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它在为美国产品谋求外国市场准入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商业成绩也成为对美国大使工作情况的首要考核标准。克林顿总统花在促进美国产品在国外销售上的时间很可能比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何其他问题上花的时间都多。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方向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迹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内，在一件又一件事情上，商业主义的需要都超越了其他目的，其中包括人权、民主、联盟关系、保持均势、技术出口管制以及一位政府官员称之为“空洞的废话”的任何其他战略的政治的考虑。

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一位前高级官员争辩说：“政府、国会和更广泛的对外政策界的许多人士仍然认为商业政策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刚好相反——美国应当利用他所有的外交政策手段来实现商业目标”。用于促进商业目标的资金应当大大增加，为实现这种目标而工作的人员的素质应当提高并且应当接受专业培训，与促进出口有关的部门需要加强和改组。在对外政策中，这个游戏的名称叫：赢得合同。

至少这是其中一种游戏的名称。另一种游戏是促进民族利益。经济利益通常是次国家的，民族利益一般来说则是超国家的或非国家的。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促进也许不象一般性的减少贸易壁垒那样关系到普遍的公众利益，但它的确能促进某些美国人的利益。民族集团则促进美国以外的人民和实体的利益。

各民族集团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新近的移民浪潮和有人提出的多样化及多文化主义的论点而得到加强。此外，更加丰富多样的民族群体及通信和交通手段的引人注目的改善使得各族裔移民与其原籍国之间保持联系变的容易得多了。结果，这些集团正在由一国疆界之内的文化群体变为超越这种疆界的移民社群。以国家为基础的移民社群，即至少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跨国文化群体，变的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维护他们原籍国的利益了。著名专家加布里埃尔·谢费尔在《生存》杂志上撰文说：“（移民）完全被他们所移居的社会同化这种做法不论在地位已经牢固的移民社群中还是在刚刚形成的移民社群中都已变得过时了——许多移民群体或者没有遇到迫使他们同化的巨大压力，或者没有感受到被移居国社会同化、甚至是取得移居国的国籍有任何明显的好处。”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这种由同化转向多样性、由民族集团转向移民社群的趋势对他的影响也最大。

最重要的是，移民社群能对移居国的行动和政策施加影响，利用他的资源和影响去为他们的原籍国的利益服务。近几年来，在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在高加索问题上、在承认马其顿、支持克罗地亚、制裁南非、援助黑非洲、干预海地局势、北约东扩、制裁古巴、北爱尔兰地争论以及以色列同期邻国关系等问题上，移民发挥了重要影响。总之，正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1997年在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所说的，美国现在“与其说有一项传统大国意义上的对外政策，不如说只是把国内选民集团提出的一系列目标拼凑在一起——其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前后不一。这不象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所应有的做法。”

国家利益被商业和民族利益所取代，这反映了对外政策的对内化。国内政治和国内利益向

来对对外政策有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恰当的。然而，以前那种认为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制定过程由于一些重要的原因而有所不同的假定已经站不住脚了。

为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所必须研究的不是美国在一个各国相互竞争的世界上的国家利益，而是需要研究经济与民族利益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至少在最近几年，后者成了预测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最佳依据。从为促进作为一个集体的美国相对于类似集体而言的利益而有意识设计的行动这一意义上说，对外政策正缓慢地、但却是稳步地消失着。

### 美国力量的压力与引力

冷战结束10年之后，关于美国的力量还存在着一种看起来很荒谬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经济力量和繁荣程度都居世界之首。他的经济原则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地的认同。他花在防务上面的钱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他有着唯一能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区采取有效行动的军事力量。他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肯定能保住这种领先地位。美国的流行文化和消费品席卷全世界，渗透到最边远和最抗拒的社会。简言之，美国在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技术和文化方面居于压倒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的影响却远远没有那么大。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穷国还是富国，友邦还是敌国，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看来所有国家都能抵制美国决策人的诱惑和威胁。在贸易保护主义、制裁、干涉、人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维持和平和其他问题上，外国政府的官员彬彬有礼的倾听美国的要求和恳求，或许还泛泛的表示同意他的主张，但过后还是不声不响的我行我素。1994年，小小的新加坡无视美国施加的极大压力，依旧对美国少年施用了笞刑。经济崩溃、陷于孤立的古巴成功的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请求波兰别与伊朗缔结武器协定，波兰根本不予理睬。美国压约旦中断同伊拉克的商业往来，约旦一直抵制。……中国则断然拒绝美国就人权问题提出的要求。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政策方面无法实现他的目标，无法劝说俄罗斯不向中国和伊朗转让武器和技术，无法除掉萨达姆、卡斯特罗、卡扎非，无法压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彼此迁就，无法说服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实行有意义的合作，无法使日本实行重大的经济改革。美国显然仍就能对任何重要的国际行动行使否决权，但是他劝诱其他国家以他认为它们应当遵循的行事方式、行动的能力与它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形象是不大相称的。

美国力量的强大与美国影响的乏力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差距应当如何解释呢？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拿一个国家的国力与它的政府的强弱相比较的结果。美国历来是一个国力强大而政府软弱的国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被当作美国力量强大的证据的大多数资源是美国政府所不易控制的。尽管它的经济居世界第一位，但它的联邦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3年为19.7%）却比收入最高的24个国家中除两个（日本和瑞士）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小。

关于力量与影响之间的差距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解释来自美国力量性质的不断变化。美国现在是、以后仍将是一个全球霸主。然而这种支配作用的性质正在改变，就像其他霸权国家所起的作用的性质已有改变一样。各霸权国家的影响在初期是来自它们化钱的能力。它们向别国部署军事力量、搞经济投资、提供贷款、行贿、派遣外交官和官员，并常常把那些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置于自己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之下。在建立霸权后的第二阶段，化钱的能力便被吸引力所取代。到70年代，美国的霸权就开始进入这个阶段了。此时，霸权第一阶段的向外扩张就让位于第二阶段向内吸引的特点了。到了90年代，美国仍在出口食品、技术、思想、文化和军事力量。然而，它却

在进口人员、资本和商品。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一般来说，它吸纳的移民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不论是种田的农民还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想移居美国。世界各地的上层人士都想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大学去读书。最重要的是，各国公司都想进入美国的市场。

吸引力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觉得把钱、商品和孩子送到美国去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然而，这仍是一种力量，而且是第二阶段霸权国家典型的力量形式。

美国在成为霸权国家的第一阶段，每年要化数十亿美元去设法影响外国政策——或许只有苏联除外——的决策、选举和政局，这肯定超过了外国政府为影响美国竞选所花费的财力总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并且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美国所采取的旨在影响外国政府的活动要么停止了，要么大大减少了。对外援助削减了，而且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它也很少进行隐蔽的干预了，为试图影响国外的选举及其他结果所化的钱仅为以前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外国机构旨在影响美国决策的努力却大大增加了。因此，美国现在与其说充当演员不如说已经变成舞台了。

外国政府和公司现在花费巨额资金在美国搞公共关系和进行游说。例如，据报道日本每年在这方面花的钱达1.5亿美元。

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致力于在国外促进十分具体的商业和民族利益的排他性对外政策。在冷战期间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些机制、资源和影响正转而为这些利益服务。克林顿政府埋头于本国政治，这也许使上述做法受到了促进，但是这样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以及对美国国家特性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内外环境方面的这些因素在近期内是极小可能改变的。可以想见，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的一些重要集团当然是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新敌人的。然而，眼下中国还不会成为足以唤起美国人新的国家特性和目的感的那样一种威胁，而且对这种威胁的严重性的判断将取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给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要想重新唤起较强的国家特性感还需要战胜美国存在的崇尚多样性及多文化主义的思想。大概需要按照乔丹委员会建议的原则限制移民的进入，并制定国营和私营部门的美国化计划，以对抗那些促使移民社群效忠于原籍国的因素，促进移民的同化。这些事情都很可能发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了多文化主义者（内森·格莱泽语），最近出现的这种非国家趋势不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

要消除对外政策中的单一目标倾向，美国公众就得致力于寻求新的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将超越商业及民族利益并使之处于从属地位。民意测验显示，目前多数美国公众对拿出大量财力捍卫美国的盟国、保护小国抵御侵略、促进人权和民主或者帮助第三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做法给予支持。其结果，政府官员对这些或其他广泛目标的阐述得不到多少响应；除极少例外情况之外，权势集团人士要求美国实行领导的呼吁也没有产生有效的行动。美国对外政策既然不能兑现他的广泛承诺，也就变成了空谈与退却的政策，政府则积极致力于促进它所专注的事情。外国政府也学会不认真对待美国政府的一般性政策声明，而是十分认真的对待它一心追逐商业和民族利益的行动。

因此，取代单一目标政策的办法不是公布一项“宏伟计划”“前后一致的战略”或“对外政策构想”，而是制定一项克制与改组的政策，其目标是对抽调美国国力为排他性的次国家、跨国家和非国家利益服务加以限制。国家的利益在于国家实行克制，看来这是现阶段美国人民愿意给予支持的唯一的国家利益。因此，对外政策精英们最好把精力用在制定一些减少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卷入，以保障可能出现的未来国家利益上，而不是制定在国外采取重大行动的不现实的计划。

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安全方面的威胁和道义方面的挑战要求美国人再度投入很大的力量来捍卫国家利益。经验证明，从低水平的基础上动员这种力量很可能比把一直用来为既定的单一目标服务的力量转到这方面要容易一些。现在发挥一种比较克制的作用可能有利于美国将来在需要唤起国家特性感来追寻美国人民愿以生命、财富和国家荣誉感去实现的那种国家目标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该校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本文原载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参考消息》1997年10月16日至18日）

## 【专题论文】

# 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

马 戎

随着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增加和人口迁移，民族问题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的普遍性问题。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形成和边界的划定是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而稳定的领土边界和社会秩序是每一个国家和平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很可能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同利益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在各种国内和国外势力的引导下，有时这些民族冲突会激化升级甚至国际化，不但破坏了社会安定，也可能会引发内战和导致国家解体，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前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正因为人们认识到各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民族冲突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何分析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利用政府的政策去逐步影响民族关系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便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自治地方占我国国土的 64%，在研究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时，十分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民族关系方面的情况和有关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介绍和讨论美国的种族、民族问题，利用了目前所能得到的资料、数据和研究文献，从美国的移民史、各族群的结构差异、政府政策的导向、族群关系现状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美国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由于没能得到 1990 年美国普查资料的分析结果，文中引用的主要是 1980 年普查结果及以前的调查资料。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很初步的分析，但是希望能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有一些启发和借鉴。

## 一. 美国的种族、民族问题的由来

美国是在近二百多年里发展起来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移民国家。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人口具有许多特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人口是由来自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的人群及他们的后裔所组成。北美大陆地域辽阔，美国的面积为 936.3 万平方公里，拥有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的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块“新大陆”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移民。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美国的移民具有 6 个主要特点：

(1)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移民的主体来自不同的国度。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来自英伦三岛的盎格鲁-萨克森人是最早来到北美大陆的殖民者，其他民族在随后的年代里为美国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制度所吸引，一潮一潮地涌入美国。自 17 世纪开始，黑人奴隶被贩卖到美洲，总计约有近 1000 万的非洲奴隶被运到了西半球，其中 80% 以上是在 1720-1820 年期间抵达的。在这 1000 万黑奴中，有 40 万人被贩运到今天美国境内的殖民地（索威尔，1993：235）。美国移民的“迁出国”构成随着世界各地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变动。19 世纪的前半叶是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的高潮，在 1840 至 1860 年期间，每 100 个移民中有 43 个爱尔兰人和 35 个德国人。19 世纪末是犹太人的移民高潮，而在 1901 至 1910 年期间，每 100 个移民中有 28 个意大利人、27 个奥匈帝国人、20 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莫鲁瓦，1977：4-5）。本世纪中叶则是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

直到本世纪的 50 年代，来自欧洲的移民仍占每年美国吸收移民总数的 50% 以上，而亚洲移民仅占 6%。但是到了 70 年代，欧洲移民所占比例已经降到 20% 以下，而亚洲移民的比例达到了 33% 以上。由于欧洲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对于欧洲人已经失去了移民的吸引力，而亚洲各国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愿意前往美国谋求发展。在这种形势下，1965 年美国国会放宽了 20 年代制定的对亚洲移民的限制，这一年政府允许 1.7 万亚洲人和 11.4 万欧洲人移民美国。在 70 年代每年有大约 16 万亚洲人来到美国，其中三分之二来自 4 个国家：菲律宾、韩国、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和印度。1981 年来到美国的亚洲人达 24.4 万，其中中国人为 2.6 万人，同年欧洲移民却降到了 6.7 万人（罗贝，1988：167-169）。1982-1985 年来自中国的移民总数为 17.7 万人，其中大陆 10.1 万人，台湾 6.4 万人，香港 2.2 万人（周敏，1995：74）。美国的移民局每年公布对于各国的“移民配额”，从而对各国来美国的移民数量进行控制。“移民配额”的构成，反映了美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

（2）移民数量大。美国的移民每年都达几十万人。20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有大约 900 万移民来到美国，移民在美国同期人口增长总额中超过了 50%，是美国历史上移民数量最多的时期。在紧接着的第二个 10 年，移民总数为 700 万人，仍然占全国人口总增长额的 40% 以上。但是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在这 10 年里进入美国的移民仅有 52.8 万人。50 年代来到美国的移民总数为 200 万，占人口增长总数的 9%。60 年代的移民为 250 万人，70 年代为 450 万人，占人口总增长的 19%（罗贝，1988：129）。根据人口普查结果，1970 年美国总人口中有 1000 万（5%）出生在国外，1980 年出生在国外的人数增加到 1400 万（总人口的 6%）。

（3）移民种类多。美国的“移民法”规定了申请移民美国的各类“优先条件”，如美国公民的配偶、子女、亲属，或者是美国公司需要的特殊人才等等可以优先申请移民。除了每年依照“移民法条例”迁入美国的几十万移民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国外人口进入美国并在美国居留：（i）求学的外国学生；（ii）来美国探亲的人；（iii）政治难民，这 3 种人都可以申请到有合法签证进入美国。

政治难民是在“移民配额”之外合法进入美国定居的移民。自 1953 年到 70 年代末期，大约有 100 万人根据国会的特别法令到美国政治避难。难民人数较多的年度是 1978 年（13.3 万，其中 66% 来自越南）和 1980 年（20.7 万）。在 1980 年被接受永久定居的外国人中有 28% 是难民。

（4）移民在教育和专业技能上一般具有较高的素质。除了政治难民之外，大多数移民的教育水准普遍比较高，其中有许多人有专业技术。特别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取得学位后有很大的比例留在美国定居，并加入正式移民的行列。许多第三世界的优秀学生来到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硕士、博士），毕业后为美国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和高收入所吸引而留在美国，如印度、菲

律宾、台湾、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有 80-90%留在了美国。这样美国可以不用支付研究生课程之前的全部社会、教育费用而得到了一批最年轻的优秀人才,而留学生的祖国把他们培养到大学毕业,结果输送给了美国。这被称为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人才掠夺”,也是美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

表 1 把美国出生的人(包括各族群)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医生、律师、记者、教授、工程师等)的比例与来自各国的移民群体相比较,反映了来自不同国度的移民具有不同水平的教育和专业素质。1980 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印度移民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占 66%,中国台湾移民占 60%,菲律宾移民占 42%,韩国移民占 34%,中国大陆移民占 30%(罗贝,1988:131)。由于移民总数中包括了儿童和少年,所以在“就业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应当大大高于表 1 中的比例。不同的教育水准使移民们在达到美国后进入了不同的职业。这些移民又对美国的相应族群(如印度移民对于美国原有的印度人后裔族群)的教育结构、职业结构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5) 有大量的非法移民。美国的非法移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持各类合法签证(探亲、求学、短期访问、临时性工作等)进入美国,在签证失效后长期滞留美国。第二类没有合法签证,以各种偷渡的方式进入美国。偷渡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是难以计算的,有一项研究估计,1980 年仅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数目就在 150-400 万人之间(罗贝,1988:139)。美国的移民局在各城市、农场查找这些非法移民并把他们遣返回国。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在亲属朋友的掩护下长期居留下来。由于非法移民在美国居住一定年限后根据“大赦”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许多非法移民在美国居住 8-10 年后申请“绿卡”,转为移民。

表 1. 美国各移民群体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

族群	%	族群	%	族群	%
美国出生者	12	德国移民	13	意大利移民	6
朝鲜移民	15	英国移民	17	墨西哥移民	2.5
菲律宾移民	20	爱尔兰移民	14.5	葡萄牙移民	2
印度移民	43	希腊移民	8	移民总体	12

资料来源:罗贝,1988:131-132。

(6) 新移民的居住地域相对集中。随着大量的移民涌入美国,沿海一些州和城市成为新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域。1980 年,在美国的 50 个州中,移民占州总人口 10% 以上的有 5 个州:加利福尼亚(15.1%),夏威夷(14.2%),纽约(13.6%),佛罗里达(10.9%)和新泽西(10.3%)。这 5 个州也被人们称为移民的“进口港”。同年的普查说明,在美国有 11 个城市的移民占城市总人口的 30% 以上,如纽约的移民有 200 万人,其他 4 个移民人口超过 50 万人的是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和旧金山(罗贝,1988:135-138)。所以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

这是这些来自不同大陆、不同国度的移民,构成了美国人口的主体,而且每年的新移民仍然在不断地加强、改变着美国人口的种族、民族构成。

## 二. 当前美国人口的种族、民族构成

虽然美国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是盎格鲁-萨克森人最早开拓了这片辽阔的土地,但是

英国人的后裔现在只占今天美国总人口的 15%，另外两大族群是德国裔（13%）和黑人（12%）。1980 年，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85%。由于美国的人口普查中关于族属的登记采取的办法是“自报家门”，各次普查登记表的族属项目又并不一致，所以时常造成数字和比例的混乱。根据 1980 年普查，白人为 1.88 亿，黑人 2700 万，“其他”人口 700 万。以前被统计为白人的拉丁美洲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等）在这次普查中被列入“其他”。

黑人是美国除了白人之外最重要的族群，1790 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黑人占总人口的 19%，其中 92%的黑人是奴隶。由于后来白人移民的大量涌入，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在 1930 年降为 9.7%，1960 年恢复到 10.5%。由于白人移民数量的逐渐减少和黑人的高生育率，自 50 年代以来黑人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1983 年约有 2820 万黑人，占总人口的 12%。预计到 2000 年黑人人口会达到 3600 万人，到 2050 年会达到 5200 万人，那时美国总人口预计为 30900 万人，黑人的比例为 17%（罗贝，1988：182）。

表 2 是 1980 年普查结果所表示的美国人口的种族、民族构成。白人占 84.6%，黑人占 12.2%，亚洲裔（华裔<sup>1</sup>、日裔、韩裔、越南裔、菲律宾裔、印度裔）约占 1.5%，拉美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占 0.9%。美国的土著居民印地安人，仅有 140 万人。由于 80 年代亚洲移民数量的增加，现在美国的亚洲裔人口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2%。由此可见美国还是一个“白人的国家”，主要的族群矛盾是在人口最多的两个族群（白人和黑人）之间。但是今后随着黑人人口因高生育率而迅速增长和亚洲移民数量的增加，美国的民族构成比例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缓慢的变化。

除了个别族群（如犹太人）之外，白人各族群之间的通婚现象很普遍。在 1980 年普查时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们有混合祖先，有 5000 万人说他们身上有部分英国血统，同时有 2300 万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对普查人员表示他们在家里不说英语（罗贝，1988：146-147）。白人和黑人的通婚很长的时期内是被禁止的，直至 1963 年还有 21 个州禁止黑人与白人结婚，1964 年联邦法院制定的法律取消了各州法律中有关禁止种族通婚的法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在 80 年代后有所增加，一些事业上成功的黑人娶到了白人妻子。在美国民族社会学中把这种高社会地位、高收入黑人男子和低社会地位、低收入白人女子的婚姻称作“上嫁”（marrying up），指白人女子凭借肤色通过婚姻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收入。

表 2. 1980 年美国人口的种族、民族构成

	人数	%	“其他”中的分族	人数	“其他”中的分族	人数
白人	1.88 亿	84.6	拉丁美洲裔	206.2 万	韩裔	33.5 万
黑人	2700 万	12.2	印地安人	140.0 万	越南裔	26.2 万
“其他”	700 万	3.2	华裔	80.6 万	夏威夷人	16.7 万
			菲律宾裔	77.5 万	爱斯基摩人	4.2 万
			日裔	70.1 万	萨摩亚人	4.2 万
总计	2.22 亿	100.0	印度裔	36.2 万	关岛-阿留申人	3.2 万

资料来源：罗贝，1988：142。

大量的族际通婚使得美国人的族属分类变得更为复杂，但是肤色和语言仍然使各族群得以相互区别和认同。在民族融合的同时，各族群之间仍然存在着种族和文化的界限。

<sup>1</sup> 据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报告，1985 年美国华人为 107.8 万。加上近年迁入或得到永久居住权（“绿卡”）者等，有的研究认为在 1990 年华人已达 150 万人（陈碧笙，1991：381）



### 三. 美国社会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两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主编的《民族》(Ethnicity)一书,书中提出了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个重要概念,同时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民族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这是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专题“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转借过来的。“社会分层”研究的是社会成员内部的分化与流动,“社会分层是各类人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人们由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罗伯逊,1990:301)。“民族分层”分析的是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由于其结构性差异所引起的不平等,这是研究民族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比如几个民族在受教育程度上(指群体而非个人)可能会存在结构性差异,教育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会影响民族成员的职业分布,而职业分布结构的不同又会影响到收入水平结构,并进而影响到该民族整体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这一系列方面都是结构性差异分析的主要内容。

具有明显结构性差异的民族集团如果生活在各自相对隔绝的区域里,这些差异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也会比较间接。但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城市社区里,几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共同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差别很大,按照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原理,则他们看待社会制度的观点和相互之间的看法是会不太相同的。一个社会中的穷人与富人在看待相互关系时,会分别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优越感。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与这种情形十分相似。

1985年,美国两位社会学家(Simpson and Yinger)出版了一本书,《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这本书利用了大量的人口普查、政府统计资料和其他各类调查材料,系统和详尽地分析了美国各种族、民族集团的社会分层情况。在美国的各项统计和研究中,通常把美国各个种族、民族群体区分为几大类:黑人(占总人口的11%)、亚洲裔人、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人、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印第安人等。由美国人口普查机构和研究部门提供的各种统计和调查资料,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分析这些以族群划分的社会集团的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 1. 产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通常分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现代化的进程,通常也是社会劳动力大量地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来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往往最低,生产工人收入高于农民,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收入最高。所以,分析各族群在各个产业领域的分布情况,可以反映出各族群介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

黑人最初被奴隶贩子运进美国的时候,主要是被用于农业劳动。所以在历史上,美国黑人务农的比例一直很高。但是由于南部农场主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在南北战争后黑人大量逃离南部农场而进入北方和西部的城市。根据美国1920年人口普查,黑人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尚有92.5万人,1940年黑人农业经营者<sup>1</sup>降至70万人,1978年黑人经营的农场降到5.7万个,到80年代末,黑人经营的农场约剩下1万个。农业黑人人口的流失最快的时期是70年代,在1970-1976的这6年期间,生活在农场的黑人人口(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从90万降至50万,同时由于

---

<sup>1</sup> 包括农场拥有者和部分拥有者、农场管理人员、租种土地者。

青壮年大量迁往城市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留在农村的黑人人口中儿童和老人占据很大比例。1982年在美国的6百万农庄居住者当中，黑人仅占4%（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71-172）。

自20年代开始，墨西哥人成为美国农业廉价劳动力的首要来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签订了协议，由墨西哥向美国提供季节性劳工。战后这一协议又延续了几十年，最后于1964年正式终止。但是在邻近墨西哥的美国西南部农业区，仍然存在着对季节性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有一些住在边境附近的墨西哥人得到了“绿卡”后，仍然居住在墨西哥，每天跨过国境去美国做工，有的在农场劳动，有的在白人家庭做女佣，由于他们每天在工作的美国 and 居住的墨西哥之间定时流动，被称为“摆动人口”（commuters）。据调查，这些“摆动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已取得美国公民权，但他们仍愿意住在消费低廉的墨西哥。除了这些合法的打工者外，每年还有大量墨西哥农民非法偷越国境到美国的农场打工。在美国农场打工的墨西哥人，由于主要是“季节工”，严格地说，他们在统计上不能被算做“农民”（指农场拥有者和部分拥有者、农场管理人员、租种土地的佃农）。

印地安人作为土著居民，其人口的主体依然居住在美国政府为他们选定的280个“保留地”<sup>1</sup>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这些“保留地”是最贫瘠的、无法耕种的土地。但是随着某些矿产资源的发现，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土地又被政府征用。“印地安人要想承租或转租任何土地都必须得到政府农业局的批准，而农业局规定的批准率通常低于地区其他土地的批准率”（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95）。这就使得印地安人离开土地十分困难同时又难以摆脱贫困。

其他移民族群如亚洲移民及后裔（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朝鲜人、越南人等）、南美洲人（波多黎各人、巴西人、古巴人等）大多居住在城镇，主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寻找就业机会，极少有人从事农业经营。这种产业的民族格局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早期发展的历史，如白人、印地安人从事农业的传统，也反映了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后来的移民集中于城市就业市场的情况。

在有些经济部门和实业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族群倾斜。例如据官方统计，1962年，全美国由黑人开办的银行只有10家，1970年上升为27家，1976年也仅为50家，而美国的银行约有上万家。这就反映出黑人族群在金融界的地位以及整体的经济实力。

## 2. 城市化程度

一个族群的城市化程度与它的人口的产业结构密切相连，同时各个族群的城市人口比重作为简单和直接的统计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各族群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程度。

美国的普查结果表明，由于黑人发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他们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近几十年来黑人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镇迁移，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1960年，在全美国的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华盛顿是唯一的一个黑人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城市。到了1980年，黑人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城市达到了9个。这一过程被美国社会学家称之为“黑人城镇化”（Black Urbanization）。1982年美国黑人住在城镇的比例高达99%。这使得黑人构成城市贫民的主体，并使种族冲突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

在1940年，美国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居民中的多数居住在农村。1960年普查结果，城市居民变成多数。之后是一个不断的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在1985年，五分之四的墨西哥裔住在城镇，而且主要集中在加州城镇。洛杉矶市成了除墨西哥城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裔居住地（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87）。

---

<sup>1</sup> 印地安人“保留地”总面积为52百万英亩，占美国领土的2.3%（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94）。

在 1950 年，印地安人主要还是居住在稳定的农业社区。但是不久各部落开始送许多年轻人迁入城镇。1970 年，在印地安人口超过 1 万的 9 个州里，印地安人中的城镇人口占印地安人总人口中的比例在 13.3-39.6% 之间（Simpson and Yinger, 1985 : 194）。但是总的来说，印地安人是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一个族群。

从其他大陆（亚洲、南美洲）来的移民族群由于没有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绝大多数居住在城镇。

### 3. 教育

教育对一个民族的社会地位的影响是非常根本的，标志着一个族群的劳动力素质和竞争能力。1930 年美国南部黑人入学率为 58.5%，白人为 67%，在 80 年代，黑人与白人的入学率达到了同等水平。1940 年，年龄在 25 岁以上的黑人与同龄白人所受教育的年限相比，差距超过 3 年。在 80 年代早期，两者之间的差距减到半年（吉尔伯特、卡尔，1992 : 92）。

美国长期以来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种族隔离，这一政策也在各级学校中实行。在 1965 年，80% 的白人学生在学生总数中 90-100% 为白人的学校读书，65% 的黑人学生在学生总数中 65-100% 为黑人的学校读书。由于黑人学校的教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都比较低，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发展都有不利的影 响。

1964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禁止在联邦资助的工程和计划中实行种族歧视，在此基础上 1965 年通过的《中小学教育法令》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的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富兰克林，1988 : 567）。美国的学校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由于不拿政府津贴和贷款，完全不受政府法令的影响。所以在相近入学率这个表面现象之下，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白人贫民和黑人的孩子则在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就读。

墨西哥裔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但比不上亚洲裔，也不如黑人。1979 年在 25 岁以上的墨西哥裔人口中，只有 34.9% 读完 4 年小学，波多黎各裔也只有 38.6% 读完 4 年小学（Simpson and Yinger, 1985 : 342）。这种教育结构对于这两个族群在美国社会里的竞争自然是十分不利的。

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族群的各级学校（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生数量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实际能力或学习质量问题。由于不同学校的经费、师资、教学条件不一样，同等学历并不一定表示达到同等能力。此外，各级学校毕业生的结构和比例是标志教育水平的一个方面，而专业领域的结构分布、各专业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及地位又是另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有重要意义的方面。而这种教育专业领域的分布结构，是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的。1980 年，黑人在应届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中占 4%，心理学占 5%，经济学占 2%，在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等学科均低于 1%。可见，少数民族在教育方面，虽然学位有所提高，但就专业结构来说，还是有很大倾斜性的。这种倾斜性对其整个民族的发展和结构性差异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 4. 就业

在 1981 年，美国 16 岁以上白人男性的就业率为 72%，而非白人男性就业率为 61%（Simpson and Yinger, 1985 : 173）。表 3 是 1970 年 10 个族群男性、女性就业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各族群就业方面的明显差别。印地安人、黑人的男性就业率最低，印地安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妇女就业率最低。男性就业率最高的是古巴人，女性就业率最高的是菲律宾人（55.2%）。菲律宾妇女在外做工可能是一个传统，目前亚洲各国的家庭女佣大量来自菲律宾。华裔男性的就业率属于中下（73.2%），女性就业率属于中上（49.5%）。

由于本表的定义是年龄 16 岁及以上人口，各族群的年龄结构因素也应考虑在内，一个人口

越年轻(指年轻的各年龄组人口比例大),就业率也就会相对高一些。把服兵役的人员排除之后,美国白人男性的就业率,在1980年为78.3%,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男性的就业率在1960年为83%,1980年降到70.8%。在1960年至1980年期间,白人女性就业率从36.5%迅速升至51.3%,黑人及有色人种女性就业率从48.2%升至53.4%(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75)。这些变化反映出美国有色人种男性就业的困难越来越大,同时也反映了近几十年来白人妇女争取经济独立性的努力。

1982年美国黑人男性中,16岁以上的失业率为20.1%,16-19岁年龄组的失业率为48.9%。相比之下,16岁以上白人男性的失业率仅为8.8%,16-19岁组的失业率为21.7%,都不到黑人失业率的45%。在这种大形势下,黑人族群的社会地位很难得到改善,黑人的不满情绪也事属必然。

表3. 1970年美国10族群分性别就业率

族群	男性	女性
古巴裔	83.7	51.0
日本裔	79.3	49.4
菲律宾裔	79.0	55.2
夏威夷土著	77.9	48.5
墨西哥裔	77.4	36.4
朝鲜裔	75.5	41.5
波多黎各裔	75.5	35.3
华裔	73.2	49.5
黑人	69.8	47.5
印地安人	63.4	31.6
全体白种人*	73.8	38.9

资料来源: Sullivan, 1978: 167。

\* 包括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

## 5. 职业

职业与社会地位和收入密切相关,分析各族群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对于理解社会中的“民族分层”十分关键。美国黑人的大多数始终处于低工资的各个职业,在60年代,当白人因为纺织业工资低而转向其他部门时,大量黑人因此就业机会而成为纺织工人。在70年代,同样的情况使许多黑人成为电话公司的操作工人(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78)。

1970年,全美工程师人数中,黑人、波多黎各裔、印第安人、墨西哥裔占总数的2.8%,而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14.4%,可见在工程领域,他们还很落后。但在文科(诸如律师等)领域,少数民族要比在理工科领域里稍强一些。因为出生率的关系,美国黑人已占到了总人口的11-12%。在职业上,1970年黑人律师在全美占律师总数的1.1%,也即是说,黑人在美国成为律师的机会为白人的十分之一。

表4把墨西哥裔、黑人与全美国的就业人口进行比较,全美的在1978年“白领雇员”已经达到50%,而黑人约为36.6%(1980年统计数字),墨西哥裔仅有27.5%。在墨西哥裔和黑人就业人员中,“蓝领”的操作工人占20-21%,这个职业在全美就业人员中只占11.5%。墨西哥裔工人半数属于低工资的“蓝领”阶级,而且很大比例是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工人。这样一个职业构成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墨西哥裔和黑人族群在美国社会“民族分层”中的地位。

在1870-1930年期间,华裔就业人员中有40.9-58%从事个体服务业(其中7.9-24%是洗衣服),

到 1970 年从事这一职业的仅剩 7.1%。从事采矿业的在 1870 年占 36.9%，到 1900 年只剩 3.1%，1970 年仅有 0.2%。从事商业、餐馆业的人员在 1870 年只占 2.1%，1970 年上升到 34.6%，成为华裔的第一大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在 1870 年只占 0.7%，1970 年占 21.2%，成为第二大职业。1870 年制造业工人只占华裔就业人员的 8.2%，1970 年占 17.3%，成为第三大职业( King and Locke, 1980: 19)。从这一百年的职业结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华人在美国努力奋斗的足迹。必须指出，自 50 年代以来，大量受过较好教育的华人新移民进入美国，这对华裔在职业结构方面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影响。

表 4. 墨西哥裔、黑人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

	墨西哥裔 (1978)	黑人 (1980)	全国 16 岁以上人口 (1978)
白领雇员 (总计) (%)	27.5	36.6	50.0
其中：1. 专业技术人员	5.6	10.9	15.1
2. 经理和行政人员	5.4	4.5	10.7
3. 推销人员	3.0	2.7	6.3
4. 办事人员	13.5	18.5	17.9
蓝领雇员 (总计) (%)	49.9	37.2	33.4
其中：1. 手工业人员	14.6	9.7	13.1
2. 操作工人	21.0	20.1	11.5
3. 运输司机	4.5	-	3.8
4. 其他非农业劳力	9.8	7.4	5.0
服务业人员 (%)	16.5	24.4	13.6
农业人员 (%)	6.1	1.7	3.0
就业人员总计 (%)	100.0	100.0	100.0
就业人员总人数 (万人)	266.5	-	9437.3

资料来源：Simpson and Yinger, 1985 : 189 ; 吉尔伯特、卡尔, 1992 : 92。

## 6. 收入

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差距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1959 年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sup>1</sup>是 5837 美元，白人家庭是 10885 美元，为黑人家庭的 1.86 倍；1975 年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是 8779 美元，白人家庭是 14268 美元，为黑人家庭的 1.63 倍 (Simpson and Yinger, 1985 : 182)。1980 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 12764 美元，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 21094 美元，为黑人家庭的 1.65 倍 (罗贝, 1988 : 186)。总的来说，各个族群平均收入的差别，是在逐渐缩小。

从表 5 可以看到，1959 年墨西哥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3811 美元，1976 年上升到 9546 美元。1970 年波多黎各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5879 美元，1976 年升到 7291 美元。1970 年居住在“保留地”的印地安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4088 美元，在城镇的印地安人家庭收入为 7566 美元，在城镇的黑人家庭为 6832 美元，同年全体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为 10474 美元。白人家庭和其他族群的收入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表 5. 美国一些族群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

<sup>1</sup> 由于“平均收入”在计算时少数收入极高的人可以对“平均值”有很大的影响，“中位数”在表现群体中等收入水平时更有意义。

	1959	1970	1975	1976
白人	10885		14268	
黑人	5837		8779	8200
城镇黑人		6822		
墨西哥裔	3811	6002		9546
波多黎各裔		5879		7291
城镇印地安人		7566		
“保留地”印地安人		4088		

资料来源：Simpson and Yinger, 1985：189-190；198。

表 6. 1970 年美国各族群家庭收入指数（以平均水准为 100）

犹太裔	172	日裔	132
法国裔	107	华裔	112
意大利裔	112	菲律宾裔	99
波兰裔	115	西印度群岛人	94
盎格鲁-萨克逊裔	107	墨西哥裔	76
爱尔兰裔	103	波多黎各裔	63
		黑人	62
全体美国人	100	印地安人	60

资料来源：索威尔，1992：5。

收入指数是分析各族群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指标。在表 6 中，我们以全体美国人的收入为 100，分析各族群家庭的收入指数。犹太裔十分重视教育，在大学里多选择经济、法律、医学等专业，许多人成为律师、教授、医生并得到了高收入。日裔、波兰裔、华裔和意大利裔是另外 4 个高收入的族群。波多黎各人、黑人和印地安人是收入最低的 3 个族群。很显然，收入是与教育水平和职业密切相关的。

比较各个族群“贫困人口”的比例，是族群分析收入差距的第三个指标。按照 1978 年美国普查局的标准，一个从事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的“贫困线”是 6662 美元，这里包括各项社会福利收入但不包括“食品券”和实物收入。根据这一标准，普查局的该年度报告表明，美国有 6.9% 的白人家庭、27.5% 的黑人家庭和 20.4% 的说西班牙语的家庭（包括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Simpson and Yinger, 1985：199）。

在 90 年代，美国黑人是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增加的唯一族群。1994 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标准是 15141 美元，该年度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 21027 美元，黑人家庭的贫困率在 1994 年是 30.6%，同期白人家庭贫困率为 11.7%（《华盛顿邮报》1995 年 10 月 6 日）。在近几年里黑人家庭收入状况的改善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因素。这里首先是立法的影响，关于在就业和报酬实现种族平等的许多法规发生了作用，其次黑人妇女就业数量的增加也使许多黑人家庭增加的收入，第三，黑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为他们争取较高收入的工作创造了条件，黑人家庭收入的逐步提高应当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有的学者指出，黑人家庭平均收入长期比较低，有一个特殊的因素不应忽略，“以妇女为户主的黑人家庭是这类白人家庭的 3 倍，...而以妇女为户主的黑人家庭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罗贝，1988：181）。这反映了黑人家庭的不稳定，以母亲为户主的单亲家庭不但收入低，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也十分不利。1981 年，50% 以上的黑人婴儿是由未婚妇女生育的，同期白人未婚妇女生育的婴儿仅占白人婴儿的 7%，就全美国而言，未婚妇女生育的婴儿占全部婴儿的 19%。

美国白人已婚人口的离婚率在 1981 年为 10%，而黑人离婚率为 23.3%（罗贝，1988：185）。在 1995 年，49% 的黑人孩子出自支离破碎的家庭，32% 的黑人高中学生没有毕业，黑人的平均失业率达到 12%，白人仅为 3%，最为严重的是 20-29 岁的黑人男性中有三分之一因犯罪而坐过监狱（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 年 10 月 19 日）。美国黑人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不稳定性对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有着消极的影响。

导致少数族裔收入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工不同酬”。“在每一个职业范围内，墨西哥裔美国人挣的钱比盎格鲁（英国裔）美国人要少 20-40%”（斯卡皮蒂，1986：91）。这种情况在黑人和其中有色人种族群中也很普遍。

尽管黑人家庭的稳定性低于白人家庭，他们的平均收入与白人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与历史上黑人的悲惨境遇相比，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应当说在过去的 30 年里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方面是黑人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另外也是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种族冲突和暴力事件造成了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黑人的地位和经济状况。同时为了建立一些种族和谐的政治象征，芝加哥、华盛顿等大城市的市长开始由黑人政治家担任；1991 年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联邦法院黑人大法官的任命，也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向社会显示黑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兵员紧张，黑人士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是黑人群体地位在战后得以升高的重要基础。70 年代之后，美国黑人运动员、艺术家的大量涌现及其在体坛、艺坛上的成就，不仅使这些个人因高收入而获到自身地位的提高，美国白人也在逐渐改变对待黑人的态度。自二战以后到 90 年代，美国黑人总体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 四. 美国种族、民族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大国，存在着世界上最复杂的种族、民族关系。美国的族群，来自全世界各地，来源最纷杂，除了印地安人之外，在今天的美国哪一个族群也没有自己的“祖居地域”。在美国的历史上曾多次爆发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因为解放黑奴甚至爆发了南北战争。这使得美国的种族、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使得美国的种族、民族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下最为发达。在西方关于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的许多种理论中，美国社会学者提出的理论在西方社会十分流行。

戈登（Milton M. Gordon）于 1964 年出版了《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该书当年即获得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的两项大奖<sup>1</sup>。这本书重点讨论了美国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以及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他认为，美国处理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叫作“盎格鲁-萨克森化”（Anglo-conformity），它的文化导向是明确地以强化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心；第二阶段叫“熔炉（主义或政策）”（Melting-pot），主张族群之间彻底相互融合；第三阶段叫“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主张承认并容忍“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实际上，这三阶段理论所反映出来的，是随着移民成分改变而造成的美国人口民族结构变化的三个不同阶段。

##### 1. 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自英国向北美移民开始，直至本世纪初。最初建立的北美 13 州都是英国殖民地，

---

<sup>1</sup> 其中一项是关于种族关系研究（Race Relations）的 the Anisfield-Wolf Award，另一项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全国大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的 the Brotherhood Award。

主要移民的来源是英国，而且移民们大多是受到宗教压迫、政治迫害而逃亡的英国新教徒和一些破产的英国农民。这些移民的文化背景无疑都是英国(盎格鲁 - 萨克森)的。为了这个移民的“主群体”与其他移民(在初期，爱尔兰人占很大比例)之间的整合，当时非常注重在移民群体中强化这种盎格鲁 - 萨克森 (Anglo-Saxon) 文化。

在杰弗逊时代，美国国务卿曾公开宣称：“我们的国家就是盎格鲁 - 萨克森 (Anglo-Saxon) 文化统治的国家，如果你不愿意学习英语，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文化，大西洋的门永远为你敞开，你可以回欧洲去”。甚至直到 1909 年还有人提出要用行政手段“割断”各移民集团与母国的联系，以此来达到同化移民的目的。那时政府的官方政策非常明确，即要求所有来到美国的移民都必须接受和学习盎格鲁 - 萨克森 (Anglo-Saxon) 文化。戈登 (Gordon) 用 “ $A+B+C+\dots=A$ ” 这个公式来对这一政策的实质加以概括，“A”表示盎格鲁 - 萨克森 (Anglo-Saxon) 文化。即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来自哪一个国家，要生活在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就必须盎格鲁 - 萨克森 (Anglo-Saxon) 化，这是一个由政府推行的、不间断的、完全的民族同化过程。这个阶段从英国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开始，历经“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

## 2. 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自本世纪初开始，直至 50-60 年代。随着欧洲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天灾人祸的巨大冲击，大量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北欧各国的移民，甚至还有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争和十月革命，不断涌入美国<sup>1</sup>。移民人口的成份和民族比例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先前的政策，要求所有的人都“盎格鲁 - 萨克森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美国，形成了许多有一定人口规模、有特定民族文化背景的种族、民族集团，族群之间时常发生冲突，这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很忧虑。

在 1918 年美国上演了一部十分流行的戏剧，名字就叫“熔炉” (*The Melting Pot*)。该剧描写的是由来自不同国度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女通过婚姻，组成了一个多文化、多宗教的美国家庭，它的成员们在日常行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等方面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经过了长期的相互调适，最后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个戏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的民族交往情形。社会学家们认为这个家庭的演变结果是解决民族差异的理想结果，并乐观地认为戏剧中的这个家庭预示了美国社会的未来。后来，就借用“熔炉” (Melting-pot) 来概括这一时期美国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政策，戈登 (Gordon) 用公式表示为 “ $A+B+C+\dots=E$ ”，意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A、B、C...)，经过在美国社会的共同生活，最后变成为具有美国文化特质的“E”即“美国人” (American)。

由于美国东部主要是英国早期移民后裔的居住地，中部、西部因为有后来的新移民 (爱尔兰农民、墨西哥人、华人、日本人等等)，才真正具有文化的多元性，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熔炉” (Melting-pot) 现象出现在美国西部。特纳 (Turner) 在 1893 年提出西部才真正是形成美国文化的摇篮。随后，也有另外一些学者指出，移民混杂的大都市也是民族融合的摇篮。这些研究对美国各民族融合的“熔炉” (Melting Pot) 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场景上都作了十分精细的分析。

## 3. 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

<sup>1</sup> 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为了面包》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家波兰农民如何来到美国，开垦林地，为了生活而艰苦挣扎的悲惨故事。



第三阶段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并没有像政治家和学者们曾经预期的那样通过“熔炉”而得到完满的解决，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也远非在逐渐消失。他们发现，在发生部分民族融合现象的同时，许多民族差异依旧顽固地保持了下来。

在美国，尤其是在城镇里，各民族居民分地区居住的现象很普遍。如纽约的曼哈顿区，南部有“唐人街”（Chinatown），也叫“中国城”，这个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人，他们有自己的善于经营的一些行业，如开餐馆、珠宝店、成衣厂、洗染店，食品店里的中国食品集中了大陆、台湾、香港的精华，各类“国货商品”无所不有，华人有自己的学校，广场上竖立着孔子像，有自己的报纸、广播电台甚至还有电视台，完全形成一个“亚文化群体”（a sub-cultural group）。在“唐人街”北面有一个“小意大利区”，那里居住的都是意大利裔，讲意大利语，有意大利餐馆，社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意大利色彩。

获得196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是一部歌舞片，名叫《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讲述的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区的波多黎各裔与意大利裔两个族群之间的械斗。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意大利裔青年，在舞会上爱上一个波多黎各裔姑娘，遭到两方家庭和亲友的激烈反对，在械斗中男主人公为了替朋友报仇，失手杀死情人的哥哥，他在潜逃中误信情人被复仇者杀死而走上大街求死，于是也被对方族群的复仇者杀死。民族的隔阂和相互仇视，终于酿成一起起人间悲剧。

这个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反映了在小小的曼哈顿岛上，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居民们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甚至很多世代的共同生活，但他们却依然保持着各自很鲜明的传统文化特点，并具有非常清醒的民族意识。即是说，尽管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来到美国后，也使用英语，按照美国联邦宪法和各州法律行事，承认这个社会总体的规范，能够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守法的公民而存在，但是他们依然保有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所以社会学家们说“熔炉并不总是发挥作用”（the Melting Pot does not always work）。后来两位社会学家根据他们对纽约市各族居民情况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本书《在“熔炉”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早在1915年，美国犹太学者卡兰（Horace Kallen）根据自己的体会就已经撰文对“盎格鲁-萨克森化”和“熔炉”理论提出质疑，并提出美国实质上是一个“（各）民族文化的联邦或共同体”（Gordon, 1964: 142）。卡兰（Kallen）在他1924年的文章中首次使用“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这个词汇。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价值”，正是“在多样性的影响中才能出现创造性”（“creation comes from the impact of diversities”）（Gordon, 1964: 147）。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假如文化是单一的话，社会就会变得十分枯燥；正是这些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可以迸发出很多的创造性，而人权的意义就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这种“多元化”使得各地区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戈登（Gordon）也用公式对此作了概括，即“ $A+B+C+\dots=E^A+E^B+E^C+\dots$ ”，表示民族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结果是产生出保留了各族文化传统的“美国人”。

1964年，戈登（Gordon）在他的这本书里第一次清楚地把这三个阶段划分出来，而且给予了上述理论分析与概括，全面地总结了美国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过程，出版之后在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三阶段理论”对我们在思考民族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是不会成功的，以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这样的优越条件来对零散进入美国的新

移民实施同化，其结果尚且如此。但是，“文化多元”并不意味着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实行“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一体”，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而且在美国不仅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在文化层次上也有很强的“一体化”，如使用英语，接受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事实上也很简单，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就寸步难行，不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无法在美国社会里与其他人和各种政府机构打交道，更谈不上就业和发展。所以，“文化多元”并没有保留具有真正独立意义的“文化群体”，只是允许在接受“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各个“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允许发展有民族背景、真正的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也将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当然，这种情形也决不会被美国政府所容忍。

在戈登之后，许多美国社会学家对美国民族关系的有关理论也在继续进行探讨。又出现了“生成文化论”和“碰撞-一体化理论”。前者表示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人们会“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如一个中国人逐渐变成一个华裔美国人，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国人了，他的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与中国人的距离就更大了，他们加入了生成的“华裔美国人”的族群。后者认为通过与其他族群交叉作用（碰撞）的结果，各文化集团逐渐改变着自身并逐步融合进美国主体文化（杨国美、黄兆群，1991：6-7）。

对于各个少数族群在美国如何发展，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提出了“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争取社会地位方面，民族聚集区（如“唐人街”）的经济发展和民族社会网络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成为少数族群（特别是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另一条途径（Porters，1980）。关于纽约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了“唐人街”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潜在力量和为华人移民适应美国社会所起的正面作用（周敏，1995）。

## 五. 美国现实社会中的种族、民族关系

由于各族群结构性差异的存在，可以说在美国社会存在着各个种族、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种族、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早期殖民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大屠杀，到南北战争前白人对几百万黑人奴隶的残酷压迫，这种矛盾与冲突贯穿着美国的整部历史。

1776年美国独立后，即迅速开始扩张领土。1803年从法国手中得到了密西西比河西岸的“路易斯安那省”（包括现在的9个州），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佛罗里达，1845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1846年占领了西北的3个州，1848年再次打败了墨西哥，夺取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3个州，1867年从沙皇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1898年战胜了西班牙之后，美国占领了波多黎各、夏威夷群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1899年占领阿留申群岛，1904年巴拿马运河区被正式割让给美国（Burner，1982：155）。在这100年的大扩张中，美国领土增加了3倍多，中西部的印地安部落、西南部的墨西哥人、太平洋各岛的土著居民都落到了美国的统治范围之内。

### 1. 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压迫的抗争

黑人是美国社会上长期受压迫的族群，作为奴隶劳动力，黑人在1865年南北战争胜利后从法律上获得了解放，但是使黑人成为“自由人”需要一个过程。南部白人农场主组织了“三K党”，对争取实施自由权利的黑人施行私刑。1871年政府颁布了制止“三K党”活动的法律，但之后“三K党”在南部各州多次复活，鞭打、杀害黑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一直到“1957年和

1958年，在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南方其他各州，杀害黑人是不受任何惩罚的”（富兰克林，1988：543）。美国各州长期以来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吴泽霖，1992：55-58），而当联邦政府颁布了废除种族隔离的各项法令，许多地方政府顽强地抵制。1957年原南部联邦的11个州联合反对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案件所做的裁决，直至总统因州长无视法院命令而派出联邦军队时，黑人儿童方能入学。黑人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种族歧视行为和黑人反抗斗争对美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据1962年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为种族歧视而付出的全部代价约值173亿美元，即国民生产总值的3.2%”。如1965年洛杉矶瓦茨地区的一次种族暴乱，即造成了34人死亡，1032人受伤，3952人被捕，财产损失约4千万美元（富兰克林，1988：565-566）。

由于黑人人数在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许多大城市中超过或接近人口的半数，为了争取黑人的选票，美国两党的政治家们开始关心黑人问题。1960年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关押，正在竞选总统的肯尼迪设法使他开释，从而得到了黑人的好感。人们分析正是黑人的选票使肯尼迪当选。1963年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的集会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号召黑人、白人相互包容。但是随后肯尼迪遇刺，1968年马丁·路德·金自己也被人枪杀，他死后在美国各地的100多个城市里连续几天发生骚乱、纵火和抢劫。1967年的“黑人权力会议”，要求“把美国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白人的祖国，另一个是黑人的祖国”。黑人组织了激进派的“黑豹党”，该党的发言人宣称，美国面临的选择要么是“黑人的彻底自由，要不就是美国的彻底毁灭”（富兰克林，1988：571）。当时黑人的暴力斗争遍及全美国，毛泽东主席为此专门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这种斗争一直延续至今。1995年由于法院对殴打黑人司机的白人警察宣判无罪，引发洛杉矶黑人的又一次暴动与骚乱。同年由于实行多年的《平等就学、就业法案》面临取消，黑人对于今后的前景十分担心。由激进派黑人领袖法拉汉发起的“黑人百万人大集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万黑人参加，激烈地指责政府，反映了黑人的焦虑和愤怒的心情。

## 2. 一度濒临灭绝的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是世代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经过白人殖民者的多次大屠杀后，残存的印地安人被驱赶进了不毛之地的“保留地”，之后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又有大量人口死亡。在1860年之前，美国政府在统计美国人口时不包括印地安人。1980年普查表明美国有140万印地安人，“自1860年...以来，这是这个民族在美国第一次超过100万人”（罗贝，1988：141）。

由于受到政府的限制，印地安人很长时间以来不能离开“保留地”，这对他们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参与现代经济活动极其不利。在白人的小说、电影中，印地安人总是面目可憎的“吃人生番”。1992年拍摄的《与狼共舞》是许多年来第一部正面描写印地安人的电影。存在于白人与印地安人之间的隔阂，实际上比白人与黑人之间还要深。自80年代以来，许多部落的印地安人，根据历史上美国政府签署后来被白人单方面撕毁的协议、契约，在与白人打官司，要求退还被侵占的土地并要求赔偿。印地安人的“索地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也成为困扰各州和联邦政府的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美国印地安人运动”通过30多年的斗争，在80年代获得了免税和自治等权力。为了缓解印地安人的贫困问题，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地安人赌博法案》，准许各州印地安人部落开设以赌博为主业的夜总会。1993年有18个州的印地安人部落设立了100家夜总会，年营业收入达60亿美元。《印地安人时报》总编辑认为，虽然这种经营可以使一些部落致富，但是“必

然彻底改变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从而加速我们（印地安人）文化的灭亡”（《环球文萃》1994年8月7日）。

### 3. 谨慎发展的亚洲人

亚裔美国人中最大的族群现在是华人。美国的华人最早是作为“苦力”来到美国的，这种用几元钱招募的华工，一旦上船之后便被关入底舱，所受到的待遇与黑奴一样。他们参与了西部铁路和其他艰苦工程的修建，但在这些工程结束之后，他们中很多人被集体屠杀，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因无路费回国，只好居住在“唐人街”里。1851年，加州有2.5万华人，1870年达到6.3万人，其中73%住在加利福尼亚（吴景超，1991：38）。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其他法律，禁止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从1854年到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正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1871年在洛杉矶，一伙白人歹徒一夜之间射杀、绞死了20名左右的华人”（索威尔，1993：178-179）。

由于受到各种法律的限制，华人在美国的发展十分艰难。许多职业禁止雇佣华人，直至1920年，美国就业华人的50%以上只能在洗衣店或餐馆打工。华人开办的商店、企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税”（索威尔，1993：181）。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美国华人从1890年的107488人减少到1920年的61639人（陈依范，1987：243）。

处于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政府，出于对日作战的实用主义的考虑，终于在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案》，允许华人加入美国籍，同年把华人每年移民限额定为105人，1945年《战时新娘法案》使包括华人在内的11.8万美军配偶移民美国。1965年之后，把各国移民限额改为东半球每年移民17万人、西半球每年移民12万人，1976年每国移民限额都定为2万人（陈依范，1987：259）。只是在这些新的移民政策实施之后，华人才有可能迁入美国定居。

与其他移民族群相比，美国华裔族群的发展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最初来到美国的华人大多是男性，1860年华人的性比例为20：1，1890年为27：1。美国当时的法律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所以美国的第一批华人中很少留下后代，直至1940年，美国华人的大多数都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新移民。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华人的特殊歧视，在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华裔决不向公共救济伸手，而靠华人内部的互助度过难关。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纽约的白人中有9%接受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华人中仅有1%（索威尔，1993：187）。与激烈反抗斗争的黑人不同，美国的华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避免与白人竞争，而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和互助来逐步改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一个十分谨慎的族群。

第二个重要的亚裔族群是日本人。日本人移民美国始于18世纪末，本世纪初达到10万人。与华人的移民方式不同，日本移民都是经过日本政府挑选的青壮年，他们在美国的权益得到了日本政府的保护。与华人“苦力”不同，90%以上的第一代日本人主要从事农业、商业和体力劳动。由于许多妇女从日本来到美国与移民男子结婚，很快就有了取得美国公民权的第二代日裔。日本移民农场主凭靠子女的公民权在1913年《外籍人土地法》颁布之后仍然保存了土地。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日裔族群在美国社会里的发展远比华人要顺利得多。

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引发了美国人对日裔的愤怒，第二年有10万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日本人被运送到阿肯色州的拘留营。这次被迫的迁移使日裔损失了4亿美元。但是同时也有30万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军人参战，在欧洲作为一线士兵，在太平洋作为翻译人员。战后日裔族群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勤奋和团结，他们在日裔集中的夏威夷州竞选议院和州长获

得成功，在今天的美国政坛上，日裔是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亚裔族群。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和美贸易巨额出超，受到日本产品影响的美国汽车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中产生了新的反日情绪。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

在美国的菲律宾裔人数不少，1980年在各亚裔族群中仅排在华裔之后，但是与其他族群相比，居住分散，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大。在美国大城市的韩国移民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自7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由于勤恳和团结，韩国移民在80年代迅速占领了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大城市的蔬菜、水果零售业。华裔、日裔和韩裔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这也许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亚裔学生在中学里的杰出表现，令白人社会十分惊奇。80年代后期加州大学限制亚裔学生入学比例，充分反映了白人社会的担心和坚持对亚裔的歧视。

#### 4. “二等白人” - 拉丁美洲裔

在人口规模上，拉丁美洲裔移民是仅次于白人和黑人的族群。在过去的一些普查中，他们有时也被统计为白人。但是他们讲西班牙语，肤色较黑，很容易与其他白人区别开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裔，其次是波多黎各裔。在历史上，美国西南部的几个州（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曾属于墨西哥，美国在战争中夺得了这些土地。那时许多农场为墨西哥农人所有。在1854-1930年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征收了200万英亩墨西哥裔的私人土地、170万英亩墨西哥裔社区拥有的土地和180万英亩其他土地，没有支付任何补偿，“这些土地的失去毁灭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农庄的经济基础”（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86）。

由于语言差异和教育水平较低，拉丁美洲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发展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地理上的便利条件使每年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进入美国，从他们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成为移民局和警方搜捕的对象。报刊上披露的许多警察暴力事件，都是与这些墨西哥裔非法移民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纠纷，有时演变成为美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的外交交涉。美国西南部的农场主年复一年地需要季节性廉价的墨西哥劳工，承为他们是支撑美国农业的重要基石，但是又绝对不希望他们留居美国，这种纯粹为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思考方式是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根源。

美国最近几次人口普查的分类中把拉丁美洲裔从“白人”中区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白人社会对他们采取的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和歧视。在美国，拉丁美洲裔实际上是“二等白人”。

#### 5. 如何看待“平等”和“公平竞争”

美国是标榜“平等”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平等”观与我们一般认为的“平等”并不完全具有同样的内涵。美国的“平等”指的是“机会的均等”和“公平竞争”，但是不考虑竞争者在自身条件方面具有的差异。一个由于家庭贫寒而仅上了4年小学的墨西哥裔青年，在就业市场上如何去与一个大学毕业的白人富家子弟竞争？在这种“公平竞争”机制下，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的工作和低收入工作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将分别由不同的族群（如白人和黑人）“世袭”下去。在考试中，“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如要真正公平，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前提条件，历史上几个世纪所造成的学习基础的不平等，不是单靠给予“平等的准考证”就可以立刻消除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提出了“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两个范畴。在法律上废除种族和民族歧视，实现民族的平等权力，只是民族平等的第一个阶段。只有通过各项措施和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帮助原来被压迫、被剥削的落后民族在教育、专业训练等方

面赶上先进民族<sup>1</sup>，消除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使所有的民族族群在社会的竞争中都能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才能实行真正的公平竞争，并发展到“事实上的平等”。只有这样的思路和作法，才是真正的力图实现公平、平等、自由的社会。

## 6. 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

最近在美国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就是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率的升高，一些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黑人）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其他少数族群的身上。黑人人数多，在许多大城市里接近或超过总人口的 50%，由于家庭不稳定、平均教育水平低，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的改善程度有限。有些黑人觉得无法与白人抗争，但是作为历史悠久的美国人，他们对亚洲新移民在教育 and 经济上的发展心里很不平衡。1991 年一个韩裔店主殴打了一个偷东西的黑人孩子，结果导致了纽约市黑人与韩裔之间持续几周的冲突。1995 年，因法院判决殴打黑人出租汽车司机的白人警察无罪，洛杉矶黑人发动了几周的骚乱，在纵火和抢劫的对象中，首当其冲的却是韩裔杂货店和华裔餐馆。

面对各种复杂的局势，美国的各个亚洲族群都在呼吁内部的团结，并在努力与黑人族群、拉丁美洲族群进行沟通和协作。今天美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依然是白人，少数族裔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同时联合同情有色人种的白人民众，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携手努力。

\* \* \* \* \*

美国的种族歧视虽然在联邦法律上是被禁止了，但是在各州的法律以及各地区自行设定的地方法规中，仍然保存着一些种族歧视的内容。而且也总有一些人为种族歧视制造舆论。1994 年美国出版的《贝尔曲线》一书，从一次智商测验中黑人平均比白人低 15 个百分点这件事出发，试图证明黑人的遗传基因使黑人天生就比白人愚蠢（《中国青年报》1994 年 10 月 28 日）。影响智商的因素除了遗传基因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后天因素，测验的具体情况也可进一步分析，但是这件事多少证明了种族偏见至今还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有一些人在制造“黄祸”和排华的舆论，要在美国真正实现林肯、马丁·路德·金的种族、民族平等之梦，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 参考书目（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陈碧笙，1991，《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陈依范，1987，《美国华人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伊恩·罗伯逊，1990，《社会学》(Ian Robertson, 1981, *Sociology*,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Inc.)，北京：商务印书馆。
- 约翰·富兰克林，1988，《美国黑人史》(John Hope Franklin, 1980,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 (fif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1992，《美国阶级结构》(Dennis Gilbert and Joseph A. Karl, 1987,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列宁，1922，“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628-634 页。
- 布·罗贝，1987，《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Bryant Bobey, 1985,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Truman Talley Books)，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sup>1</sup> 列宁认为，为了帮助落后的小民族发展起来并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过去压迫过他们的大民族必须“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列宁，1922：628）。

- 安德列·莫鲁瓦, 1977, 《美国史》(Andre Maurois, 1964, *A History of the US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弗·斯卡皮蒂, 1986, 《美国社会问题》(Frank R. Scarpitti, 1974, *Social Problem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托马斯·索威尔, 1993, 《美国种族简史》(Thomas Sowell, 1981,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吴景超, 1991, 《唐人街: 共生与同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吴泽霖, 19992, 《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杨国美、黄兆群, 1991, “中美学术界关于美利坚民族性质的研究”,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7期, 第2-7页。
- 周敏, 1995, 《唐人街: 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Min Zhou, 1992,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Burner, David and et al, 1982, *An American Portrait*, New Jersey: Revisionary Press.
- Glazer, N and D.P. Moynihan, 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Glazer, N and D.P. Moynihan, eds. 1975,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ng, H. and F. B. Locke, 1980, “Chinese in the U.S.: A Century of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4(1): 15-41.
- Simpson, G. E and J. M. Yinger, 198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ullivan, T. A., 1978,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F. Dean and W. Frisbie, eds.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65-188.

## 【读书笔记】

### 在美国的华人：一部职业变迁的百年史

(Haitung King 和 Frances B. Locke 著) 郑宇

这篇论文分析的是美籍华人在过去一百年中变化着的职业格局,这一研究建立在历史分流的假设基础上,即:在美籍华人这个少数群体职业结构形成过程中,从最初年份就开始存在的,指向华人的连续的法律的和社会经济的限制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在1850年到1880年间这个高经济增长时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通过签定契约而被带到美国西部做矿工、筑(铁)路工人、开荒等等。尽管由于劳动力的奇缺,中国最初是受欢迎的,继而还能被容忍,但随后作为加州劳工和政党政治互动的结果,一种对立、反感(针对中国劳工)的情绪发展起来。无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使这种互动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反华人的运动就表现为闹事、骚乱、残害(华人)等等,最终导致在国家和州的层面上通过“阶级”和“种族”立法来控制中国移民。阶级立法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各种税收和政治、经济甚至教育权的否定。同时伴随着通过一系列严格而排斥的标准建立起来的种族立法。作为这种限制的结果,华人劳动

力禁入美国，而在美国定居的华人被否决居民权。随着 1924 年民族起源的配额法令这一文件的出现，即使华人的美国妻子也包括在内（受到限制）。对于年龄、性别和出生地分配的这些立法标准的冲击，自然对华人的职业结构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这种针对华人的障碍持续到 1943 年。从这一年起，对于想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每年被分配给 100 名配额的标准。到 1965 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法令，同时废除了 1924 年的法令，年度移民定额以半球为标准，从这时起，中国人被接纳移民的数量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从 1965 年起大约每年有 18000 人。就象预期的那样，这个少数群体的职业结构由于近代象洪水一样的移民潮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积极的、消极的都有。

这篇文章分析了上面所提到的由立法和社会经济限制的历史分流的过程中，过去 100 年间（截止于 70 年代末期）美国华人职业格局的变迁。这个描述包括历史背景、职业调整（过去和现在）、出生地的比较、华人企业家、“唐人街”的次经济（sub-economy）和有工作经验的华人的健康状况。

这个研究所使用的的数据资源主要是各种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出版物，并以其他报道发现作为补充。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文中所用“一代”、“二代”是用来指外国出生和本土出生的美籍中国人，为了更明显地在第二和第三代华裔美国人中做出比较，用了“三代”这个词。

### 一、职业的调整

#### • 一般趋向的考察

1849 年，美国兴起淘金热运动，第一批中国劳工于是来到矿业做工。但随着前面提到的针对中国人的怨恨的增长，中国劳工开始寻求其他的就业途径，主要是在一些对白人没有吸引力因而竞争性不强的领域，如“个人服务业”和“批发及零售商业”。这其中包括他们开始向远离太平洋海岸的对华人的态度更宽容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域迁移。这种进程是逐年增长的。

在其他的资料中，由于缺乏可供比较的统计资料 and 以“产业”、“职业”群体分类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过去年代中阻碍了研究者对于变迁趋向的更细致深入的分析。然而，检验文章提供的宏观信息、以及通过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所得到的粗略的比较，这种观察仍然可以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华人的职业结构表现为两种明显不同的格局。第一个时期是移民的初期，中国人集中在矿业，接下来是农业和商业工人数量的增长，以及有很大先控权的个人服务业。1930 年开始了华人职业结构的新的调整时期，华人在矿业工作的人数近乎 0%，而 1930 年在个人服务业的人数为 47%，这些人中的 50% 是洗衣工人。另外商业工人数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从 1870 年代的 1.7% 到 1930 年代的 30.8%，到 1970 年达到了 34.6%，他们中的一半是饭馆工人。因而这两类工人（商业工人、饭馆工人）被认为是华人职业的旧框架格局。

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变化，特别是华人获得许可（进入美国）比较容易，使得从 1930 年起，华人移民开始了新的一页。例如，待遇较差的个人服务业的华人由 1930 年的 47% 降到 1970 年的 7%，相对而言，他们的白人对手在同期却有 2.3% 的增长。并且，同时期白人中工人的比重为 47%，华人为 35%。

很明显，华人专业技术人员表现出了一种令人关注的增长，在 1970 年多达 21%，优于白人 4 个百分点。另一个另人鼓舞和值得注意的增长趋向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人员有一个较小的扩展，1960 年为 3.7%，1970 年为 5.2%，在产业中华人的增长超过了美国白人。例如：加工业和通信及公众事业等。

在这一时期，华人在商业战线上从 1930 年后继续增长，但不是特别快，1960 年达到 38%，



然后是一个下降的 10 年，到 1970 年时为 34.6%，而白人对手 1970 年为 21%，比 1960 年增长了 10%，相比而言，华人的比重下降了 9%。

在文章的表 2 中表现了职业群体的发展趋向。尽管在人口普查中，用“职业”和“产业”两个概念变量，运用不同的分类方案，但在所有群体中观察出的变化（作为结果）却是相似的。例如，在男性华人中，从 1940 年到 1970 年 7 月，专业技术人员有较多的增长，伴随着其他工作群体人数的下降，明显的表现是在服务业。大概值得注意的是华人男性管理者人数在 1960 年到 1970 年间下降了，这和民族变化（指中国移民增多）相反，归因于传统职业如洗衣工人的数量下降了。

在女性中，服务业工人数量实际显示下降了 49%，相比而言，华人男性专业技术人员表现出了令人深刻的增长，达 154%。然而，通过 1970 年的频次分配和数量变化（从 1940 年以来）来判断，华人男性专业技术人员 and 他们的男对手相比而言不是很有利。

在总体上令人鼓舞的变化（从 1930 年以来）不会转移作者分析一些不太明显但可悲的职业变迁现状，如华人男性专业技术人员不对称的亚群体分布。

个人服务业工人分布轮廓图显示出一个相似的高集中（在受限群体中）。例如，83%的华人男性在饮食服务业工作，这其中有 51%的厨师和 28%的侍者，相对应的白人分别占 24%、33% 和 12%的比例。

从不同着眼点考虑，需要指出的是一定的未被充分代表的职业、中国人有收入的管理者和行政人员的数量明显不足。

- 发现性的解释

人们可以思考前面的假设（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 60 年中，从事一种行业或另外行业的华人数量快速地升降，随第一批移民开始，仅仅表明他们的反映性的（敏感的）判断和再决策（对各种针对他们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的后果产生出一种趋于循环的格局模式（从一点回旋到另一点）。例如，华人手工艺人的低比率可以追溯到早期美国劳工反华人运动和他们曾经长期存在的对中国人向上流动的影响。华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延缓增长可能与此有相似的解释——Li（1978）的综合了多位作者假设的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男性优势的连锁影响和本土出生华人的相对空缺（直到现在），所有这些主要是从早期的限制运动，包括禁止通婚而得出的结论。同样，早期的限制使华人专业技术人士在技术领域和比较沮丧的有收入管理者和行政事务人员的一定数量的高度集中，似乎反映了这个去不掉的早期开始的歧视的影响。从不同的利益观，华人专业技术人士进入到限制性专业领域的途径可以看作在这个少数群体中的智慧阶层职业调整的形成。

撇开在华人移民职业格局形成中提到的历史限制，另外的补充力量应被考虑。例如，华人在商业和个人服务业最初的集中是出于社会经济私利的因素而联合促成的。例如，资本的最小需求和小商业（经营）的小量付费雇佣；高度市场技能和语言精通性的缺乏；同所有权相连的有声望的社会地位（能够推动华人移民进入他们居住地的中心位置）。继续进入这些行业似乎是通过亲属的援助而得到的增强（近来 Li 的研究暗示了这点，1978）。近来华人专业技术人士值得思考的增长，下面因素扮演了主要角色；对非白人歧视的下降和二战后对中国移民更好的雇佣机会的提供；本土出生华人的增长；1949 年后中国政权的变革鼓动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来到美国；特别是对华人（许多为高学历）进入美国得到许可的容易性。这个最后的因素可以部分解释在过去的 10 年中，在华人知识分子当中不断增宽的教育职业群。从另一个方面，近来象洪水一样涌入的移民中还包括一大批受教育程度低的华人，他们主要来自香港，他们对本土出生的华人在一

定职业中的分配是有影响的。

## 二、出生地的比较

Yuan 解释了从事经济事务华人出生地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建立在对 1960 年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作为在本土出生和国外出生华人移民获得了不同教育的反映。他暗示这个标准是为了评估以下诸对因素间的对应关系:文盲及受过基本教育和洗衣服务业,高中教育和餐馆业,大学教育和专业技术工作等结合起来。然而,当这个相同的一套数据因为在“一代”和“二代”之间由于年龄不同而作出调整时,通过出生地这个变量在劳动分组中导致的不一致变得不太清晰时的分离。尽管“一代”中一小部分人完成了 1-3 年和特殊的 4 年高中教育,他们在中等水平商业行业中是超过解释的(对应关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个人服务业中“一代”的分配明显没有达到(符合)他们中大学教育的高比例。

1970 年普查中的数据只允许在教育和职业之间通过出生地做比较,体现在数据表 4 中。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一代”男性中有较小的一部分(低于描述的)在专业技术领域中服务。伴随着受过教育的“二代”人中在其他白领领域中有一个较大的缺陷。这样,对在“二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的观察这种在教育和职业之间的不协调性,明显指出在有收入的管理、行政领域中的华人中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相似地,专业技术领域的不足预示着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华人的是受限制的机会。在从事商业行业领域的“一代”中,在教育和雇佣工之间的不一致看来符合李的“亲属援助是在移民中对教育不足的一种补充资源”的假设。

最后,自从 1930 年以来,给在两种出生地群体的职业结构中带来明显变化的一些主要力量,可能在表 2 中简要地指出了。这些对分析“一代”男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增长的有贡献的因素已较早地推测出来。对新流入人口的影响反映在 1970 年“一代”中服务工人的巨大增长,明显归因于低教育的香港中国人的大量涌入。更值得注意的是,比“一代”相当低比率的“二代”男性服务人员的数量在 1960 年和 1970 年显现出来,随着以前高比例的其他白领和蓝领人员,看来表明给予“二代”的是相当宽而好的就业机会,尽管在教育和职业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在“一代”女性中,从 1940 年以来在“其他蓝领”业中做工的稳定的优势不应导致任何惊讶,自从她们中的主体从事服务制造业以来。

## 三. 华人企业家

已经发现“国外出生的商业人士超出描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对于国外出生的企业群来讲不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证据……”(Light,1972)。一个古典的例子可以在华人从事经济中发现,这些人经营的商业企业(外在于社会经济权术)不是体现“企业家的意识。”这个对于在传统的“等级体系”奏效的环境中的南方华人看来特别真实。宁愿和有优势的其他少数群体的劳动力竞争,华人选择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地位的增长作为他们的目标。这样,人口普查统计(1960 年)显示出在南方的华人男性业主和管理者的频次分配大约是西部和北方的 2 到 3 倍。这一点通过 Mississippi 研究的结果被证实。1960 年,97%的华人住在 H·Delta 城或从事食品杂货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看来至少以获取利益为目标的华人商人取得的“所谓的成功”已经思考了许多(Weber,1917)。关于华人信息的缺乏,1922 年对亚裔拥有企业的普查研究仅仅能够得出一个粗略地推论。对于所有行业和零售商业,亚裔人企业特别是食品店和它的连锁店、杂货店,比调查的所有少数群体来说每家企业能够得到的平均总收入。而华人企业和所有其他亚洲人所有企业相比较而言,获得的是最高的总体收入(对所有联合行业来讲)。由于建立在粗略数据基础上的比较可能带来误导,所以这些发现必须要小心解释。

华人企业运行动力被报道在对华人拥有杂货店的两个研究中：对待顾客的令人愉快的态度；先进的经营手法和一种紧密而有用的扩大家庭成员体系都是取得成功的因素。对华人企业家神话的更系统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 四、“唐人街”亚经济

近些年来，对华人整体令人鼓舞的宏观职业结构的描述，不应蒙蔽我们去客观地分析渐渐变化的“唐人街”亚经济，并且由此去呼唤一种严谨的检验分析。

一般都知道作为华人居住区域或贫民区的“唐人街”（中国城，China Town）是“一个非华人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但共生性地依附于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Lee, 1949a）。在这个支配性社会中，不仅“唐人街”的繁荣与衰落总是随着商业的景气和景气而波动起伏，而且亚经济也同样遭受同样的情况，从它对一种或两种行业的严重依赖，并伴随着一定的自我强加的障碍，在下面将做一分析。

“唐人街”在主要城市中心的发展最初是作为一种经济调节的机制——对在这个敌意国家对中国抱有偏见和歧视的反映而出现的。这些社区很快变得很受欢迎，并证明是成功的，在满足它们居民的一定基本需求方面有很大作用，例如：互相帮助，市民保护和民族消费物品的供应等等。同时这些社区对居民保持对民族文化的骄傲感性、友善的意识以及用来处理内部事物的“内部政府”等有很大作用。

这种华人的职业结构（在主要“唐人街”中）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对总体纽约市“唐人街”美籍华人的职业结构状况。例如，（几个主要“唐人街”）除了在职务阶层中有一个3%的低比率以外，平衡几乎平等地分布在服务业和其他蓝领行业中，分别占46.1%和51.2%，而在整个全美的美籍华人中，1970年50%的比例是白领工作者。

在脑海中提供这个背景信息，我们将分析“唐人街”两个主要行业的目前现状：旅游——饮食和服务制造。这种旅游——餐饮联合体是由古董和纪念品商店、饭馆、副食品店、杂货店和许多批发及零售店构成，这也是华人受雇佣的渠道。在它的繁荣景象背后，有许多遗留下来的阴暗面，例如：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更近的，自从1966年主要的“唐人街”已被大量涌入的新移民挤满了，新的移民主要源于香港，并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犯罪率升高等。

“唐人街”亚经济的恶化据说归因于它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从经济学上讲，“唐人街”单一地、死板地束缚于旅游——餐饮或制衣业；从社会角度，这个非正式的华人群体顽固地选择这种结构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是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公共福利。这种文化的和制度的综合假设，象 Light 和 Wang 最近指出的那样，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

#### 五、具有工作经历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根据职业，关于华人和其他亚裔少数群体已出版的国家健康统计资料是无效的（无用的）。实际上职业死亡率数据（对整体美国人口）的发表是受限制的，最近的报道是建立在1950年统计出的特殊列表，表5中显示的是华人和日裔年龄在20到64岁之间有工作经历的限制性非出版数据。

从表5中可以看出华人的健康状况要比日裔和美国白人差。可以看出在服务业和其他蓝领业的华人工作者中存在极高的死亡率，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他们中的主体代表了一个具有高健康风险（由工作性质决定）群体。

由于自杀导致的死亡率（在“唐人街”男人中），尽管是一种缓慢地增长，但似乎也反映了

“一代”生活的悲惨，特别是老年人（无助、孤独、健康、恶化等）。1973年旧金山的研究报道表明，61%的男性华人自杀，其中21%的人是由于失业，另外21%是厨师和退休人员，55是熟练技术劳动力，7%是洗衣房和饭馆工人。华人移民女性中自杀死亡的，在“一代”的制衣工人中表现显著，这与英国的情况相似。

## 六、小结

作者在这一部分总结了从以上不同方面对（在美国的）华人职业结构的百年变迁所做分析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我个人认为作者以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得出的判断是客观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华裔人口职业的分层和流动的状况，从而对中国移民这样一个少数群体有了较深的理解。

最后作者指出对华人的职业结构更深入的洞察需要详细进入深入领域的调查，特别是各种角度的职业流动。一个较早的个案分析是由Kuoh对美国出生的中国男性大学毕业生的“雇佣定位（在和不在“唐人街”）”、“目前的定位”及“第一个职位”这几个变量所做的最新论述，并且同他们的兄弟、父亲的职业地位相比较。另外，Li对职业流动和亲属援助的研究，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新的一种努力。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97级硕士研究生）

## 【学术活动信息】

# 北京大学人类学所

1997-1998 学年第一学期“读书会”内容安排

- 9月11日 “评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刘世定，本所教授）
- 9月25日 “鲍得利亚得文化理论介绍”（高丙中，本所副教授）
- 10月9日 “评布洛克《从祈福到暴力》”（胡宗泽，97级硕士生）
- 10月16日 “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于长江，本所讲师、96级博士生）
- 10月23日 “评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赵旭东，95级博士生）
- 10月30日 “科思、诺思等的《财产权利于制度变迁》”（杨贵凤，95级硕士生）
- 11月6日 “学者的研究取向与农村社会的命运”（郭建如，95级硕士生）
- 11月13日 “韩少功《马桥词典》的人类学诠释”（田青，95级硕士生）
- 11月20日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国家理论综述”（刘玉照，95级硕士生）
- 11月27日 “景德镇民窑研究介绍”（方李莉，博士后研究人员）
- 12月4日 “日本满铁农村调查及其资料使用”（张思，博士后研究人员）
- 12月11日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包胜勇，96级硕士生）
- 12月18日 “对中国社会的解读”（王铭铭，本所副教授）
- 12月25日 “帕森斯与哈耶克的早期社会理论”（方卫华，96级博士生）

---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本期责任编辑：蒋力蕴

邮 编：100871